

非条约口岸 城市化道路

近代长江三角洲的
典型考察

FEITIAOYUE KOUAN CHENGSHIHUA DAOLU
JINDAI CHANGJIANGSANJIAOZHOU DE
DIANXING KAOCHA

郑 忠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作者简介

郑忠 1968年生，江苏徐州人。2000年12月毕业于南京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02年4月至2005年6月在复旦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城市史、抗战时期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曾参与出版《“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中国审计史》第二卷（中国时代出版社，2004），在《中国农史》、《复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曾被评为南京师范大学“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

非条约口岸城市化道路

近代长江三角洲的典型考察

郑 忠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序

郑忠教授的《非条约口岸城市化道路——近代长江三角洲的典型考察》一书行将付梓,要我一定写几句话推介一下。其实,题目本身已表明,这是一项很具新意的研究。本书是作者在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出站后,作者又精心做了重要修改和大量补充,资料非常翔实,立论显示作者勇于探索、勇于思考,敢于在理论上做出新的突破。

近代中国的城市化和中国传统城市的近代化或现代化,与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一样,基本上都是由外铄引发内生,由内生回应外铄。外铄,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入侵和对中华传统文明的全方位挑战;内生,主要是中国传统城市、传统商业、传统工业原先规模型的发展,在外来挑战面前表现出的强大应对能力。如果说,依据诸多不平等条约开埠通商的口岸城市的崛起,外铄因素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那么众多非条约口岸城市近代的转型和发展,则更多显示了近代中国城市化和中国传统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内生因素不可忽视的作用。

关于口岸城市的研究,国内外已有许多很出色的成果,而非条约口岸城市的研究,则还比较冷落。这自然是口岸城市影响较大,非条

约口岸城市影响相对较小所致,而非条约口岸城市资料分散、零星,搜集不易,原有研究基础比较薄弱,恐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本书作者选择了这一空白点,力求给予突破,就必须花大力气,克服这些困难。

作者在本书中,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中小传统行政城市南通、无锡、常州为自己主攻对象。其中常州,是较大的行政中心城市。清朝时,它统辖着无锡、宜兴、江阴、靖江等地,是苏南地区重要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无锡,原是常州府所辖一个县一级的行政建置单位,既非军事要地,又非政治、经济中心。南通,即通州,原先也只是县、州一级的行政机构驻地,行使着地方行政管理的职能。近代以来,它们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几乎在差不多时间里都一跃而成为以现代纺织、缫丝、面粉三大现代工业为主,工商业都相当发达的现代城市。如作者所说,这三个城市的发展,都鲜明体现着“本土化”的特点,即中国传统城市所走的是适应自身自然、历史、经济、文化条件的工业化、商业化道路。这些传统城市向近代工商业城市的快速转型,给人们提供了中国内生因素在外铄因素刺激和冲击下实现城市现代化非常典型的范例。

作者的研究,并没有仅仅局限于以上三个城市,他的视野还扩展到长江三角洲及更大范围。他指出,由于地理条件和历史基础不同,中国传统城市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命运和前途:一种是在沿海、沿江的条约通商口岸城市中,资本主义因素在城市明显增长,近代城市功能逐步形成。在非条约口岸城市中,一种是城市功能能适时地进行调整、转轨,引进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使中国小农经济土壤上生长出来的城市功能日益扩大,近代城市机能出现并不断增长,在城市规模、人口结构、社会结构、城市社会生活、城市建设与管理、城乡关系以及市民意识等方面向近代型城市过渡。还有一种,

是城市功能不能适时地进行调整、转轨,逐渐走向衰退。这三种情况在长江三角洲区域内部都表现得非常突出。因此,近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区域城市体系出现了重新组合的趋势。周围农村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具有优越的海运条件的条约通商口岸城市——上海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突破了传统城市的性质和功能,由单一型城市向综合性、多功能性及外向型城市转变,并迅速崛起,成为长江三角洲区域的经济中心城市。而传统商品经济发展比较充分、地理环境比较优越的非条约口岸南通、无锡、常州,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影响及上海的经济辐射等外力推动下,积极发展近代工业,转变传统城市功能,使得城市向近代轻工业城市转型,进而形成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二级经济中心。相反,以运河航运为枢纽,以盐业为基础的非条约口岸扬州,则因盐商的解体、运河体系的瓦解,产业无法转型而导致商业、贸易功能丧失,加之战争的破坏,在整个 19 世纪都处于持续性衰退之中,沦为长江三角洲区域内的一般城市。由此可见,同是非条约口岸城市,其在发展过程中由于所依赖的经济基础不同,所具备的适应能力和素质不同,所取得的成就和呈现出来的发展状态也就各异。

本书通过艰辛的劳动,梳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生动地说明无锡、常州棉纺织业如何调整了经营方针策略,引进了先进的经营管理技术与理念,在农村土布业衰退的情况下,仍然继续在发展;而南通纱厂的发展,则因对国内土布市场需求旺盛(尤其是关庄布的需求),反过来刺激了手工织业的发展。但它们毫无例外地都积极利用了上海强大的经济实体在技术、设备、资金及市场方面的辐射力,因而使三地民族工业在发展的深度、广度方面都超过其他非条约口岸城市,无锡甚至还超过了相当一大批条约口岸城市,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长江三角洲区域内,便利的长江航运、铁路、公路运输,使得上海与三地各企业集团之间建立了密切的产销关系、融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

三地城乡经济与上海经济的一体化联系,使得长江三角洲区域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完整的以上海为中心的区域市场网络体系。这三个非口岸城市向近代城市转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书在研究这三个非口岸城市的发展时,还特别注意到,企业家是工业企业的中枢,企业家群体的素质与精神的发挥,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张謇、荣宗敬、荣德生、刘国钧等人在这三个非口岸城市崛起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新型企业家群体的形成,又和这些城市对教育、文化及社会建设的重视密不可分。

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是一个将持续相当长时间的历史性过程。在这一历史性过程中,由外铄引发内生,由内生回应外铄,这双重的运动也将会一直持续着。人们将在实践的基础上继续努力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独特的发展路径。在中国大地上正滚滚向前的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浪潮,要求中国城市史研究有新的重大的突破,也必然会推动中国城市史研究实现新的重大的突破。超越目前研究过多集中于少数几个新兴大城市(主要都是原条约口岸城市)的状况,克服和改变城市史研究理论上、视角上的偏颇,对近代以来中国不同类型的城市、城市群体、城市网络开展立体化的综合研究,使研究领域大大拓展,不断深化,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有极高的价值。期待作者和其他众多有志者,在这方面给人们提供更多新的研究成果。

姜义华

2010年11月于复旦大学

目 录

导言	1
第一节 选题意义	2
第二节 研究状况及资料综述	4
第三节 研究理论和方法	15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框架	23
 第一章 长江三角洲近代非条约口岸城市发展的环境分析	28
第一节 自然环境和区位特征	29
第二节 经济环境与工业化	38
第三节 政治环境	49
第四节 人文环境及其特征	59
小结	69
 第二章 长江三角洲非条约口岸南通、无锡、常州 城市近代化考察	74
第一节 南通、无锡、常州近代城市工商业的转型	74
第二节 南通、无锡、常州近代城市人口结构变迁	128
第三节 南通、无锡、常州近代城市社会结构变迁	141
第四节 南通、无锡、常州近代城市文化教育、观念和习俗的	

流变	163
第五节 南通、无锡、常州近代城市建设和治理的改进	182
小结	205
第三章 长江三角洲近代非条约口岸城市化道路	
——南通、无锡、常州发展模式考察	219
第一节 个性透视：南通、无锡、常州发展模式的差异	221
第二节 共性模式：区域中心城市的生长	242
第三节 非条约口岸：步履维艰的扬州城市化发展	282
小结	289
第四章 长江三角洲城市近代化的比较考察	298
第一节 条约口岸城市发展模式简论	298
第二节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下城市近代化特征	333
第三节 长江三角洲城市功能结构的变迁及影响	348
总结	360
第一节 历史启示	360
第二节 对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化社会之展望	368
主要参考文献	373
后记	393

导 言

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最令人瞩目的是出现了一批“条约口岸城市”。这些城市是按照不平等条约的规定而开放的。据统计,从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开辟广州、上海、厦门、宁波、福州五口为开端,至1922年中国先后开放的商埠口岸共计79个。^[1]相对而言,那些由中国政府自行开放的商埠城市、从传统中走出来的行政中心城市、工矿业城市及工商业城市则被纳入非条约口岸城市之列。按此分类,长江三角洲的近代城市中,条约口岸城市主要有上海、南京、杭州、苏州、镇江、宁波、芜湖、安庆等,非条约口岸城市则包括无锡、南通、常州、扬州等。其中,无锡、南通、常州三座城市在近代中国众多非条约口岸城市中取得了很突出的发展成就,从而成为基本依靠自身民族工业振兴而发展起来的城市近代化的典型,并且表现出各自独特的城市发展特色,为中国近代城市史增加了一抹亮色。近年来,关于南通、无锡、常州城市近代化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而学者们纷纷就这些个案城市发展的原因、转型的过程及特点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本人不揣浅陋,愿以此三城市为例,就近代长江三角洲非条约口岸城市发展的环境、过程、模式、与条约口岸城市间的比较及对长江三角洲区域乃至中国城市近代化的意义等进行一番典型性考察与研究,以便进一步探索中国区域城市发展及不

同类型城市近代化的发展道路,并可为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些历史的借鉴。

第一节 选题意义

如果我们对 80 年代以来近代中国城市史的研究状况加以分析,不难发现,大多数选题都集中在对上海、天津、武汉等近代开埠通商口岸大城市的研究上,但对于分布广泛的中等类型非条约口岸城市的关注却远远不够。原因是综合比较研究有相当大的难度。因此,从目前城市史研究的学术进展来看,选择上海周边南通、无锡、常州、镇江、宁波等中等经济城市进行区域性综合比较研究,并探索近代中国中等经济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情。^[2]一是虽然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对长江三角洲这些中等经济城市作过专题性个案研究分析,但是难以在资料方面有更进一步的挖掘。二是这些研究成果多从全面现代化的角度进行考察,而于城市发展的其他理论层次上难以突破。更为重要的是,近年来随着海内外“上海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特别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张仲礼先生主持的《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两项重大课题成果的先后出版,使后进者从学理上突破长江三角洲城市研究的难度更大。

然而,我之所以选择这一困难很大的课题,完全取决于我的两次非常重要的学术机缘。一是 1997 年至 2001 年间,我师从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崔之清教授攻读中国近现代史的博士学位。在他的引导下,我开始对近代长江三角洲地区南通、无锡、常州等中等经济城市展开研究。其间,我还得到了茅家琦先生、朱庆葆先生的悉心指导与帮助,他们使我得以用更广阔的研究视角来

探悉条约口岸、非条约口岸城市发展的基本脉络。二是2002年我进入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姜义华教授成为我进一步深化城市史研究的联系导师。姜义华先生是中外现代化研究的著名专家,其作为思想家的独到视野使我在城市史研究中受益匪浅,思考空间遂得以扩展。通过与姜先生对城市现代化理论的不断对话与交流,我深刻地认识到,对长江三角洲区域非条约口岸城市发展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某个个体城市近代化的孤立思考上,更应该将这些城市当作一个生命体系来看待。这是一种动态化的思考方式。尽管我知道这种研究的任务艰巨,但想来这种对中国区域城市发展道路的新的研究方式,也算是在学术研究中一种有益的创新尝试。

首先,就课题研究对象的选择而言,本课题选择南通、无锡、常州等以新兴工业为主导功能的中等经济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具有典型意义。应当承认,目前中国城市史研究倾向于摆脱仅限于少数近代新兴大城市(主要都是条约口岸城市)的探索,力图改变城市史研究理论上的偏颇与肤浅。开展对近代不同类型城市、城市群体、城市网络的研究,将有助于城市史研究领域的拓展。长江三角洲区域城市中,南通、无锡、常州三个城市都是非常重要的中等经济城市。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较快的工商业城市,它们并非通过不平等条约开埠通商的“条约口岸城市”,而是通过“传统内变迁”,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后,兴起工业化浪潮而走上快速发展道路的“非条约口岸城市”。其广泛的代表性,对于探索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下中国城市近代化的特征与道路,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其次,通过长江三角洲区域内两种不同类型城市(条约口岸与非条约口岸城市)的比较研究,对揭示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一般性规律

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中国城市史研究中,区域城市史研究是城市史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城市中所出现的种种历史现象,往往只有站在区域研究的高度才能解释清楚。正如有些学者所言,区域研究可以使个案城市研究中许多难以解释的问题得以合理的解答。^[3]另外,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也造成了区域城市发展进程和水平上的极大差异。因此,开展对城市化水平较高地区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探索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基本规律。

第三,长江三角洲历来就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一个区域,它的发展与否对中国经济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尤其是近代以来,由于上海开埠,租界兴起,近代工商业、金融业发展引人注目。上海自身城市格局与发展模式不但发生巨变,取代苏州、杭州而成为长江三角洲新的核心城市,还带动了整个长江三角洲经济由封闭转向开放。在它周围,原有的“在传统内变迁”的南通、无锡、常州、扬州等中等城市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的挑战,并依据各自优势走出了各自不同的近代化道路,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随着目前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长江三角洲区域城市近代化研究更具其现实意义。

第二节 研究状况及资料综述

中国独立的近代城市史学研究是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才逐步兴起的。从学科的源流上看,可看作是西方城市史学的派生,一开始就吸取西方城市史学的研究成果,直奔主题。但由于中西文化的长期隔阂,中国学者对这些研究成果了解不深入、不全面。可以说,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是在缺少理论和方法借鉴的情况下起步的。为此,许多学者在城市史理论研究方面进

行了不懈地探索,取得了一些进展,如大量的个案城市、区域城市群体的研究屡有成果,推动了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和深入。

1. 条约口岸个案城市的研究模式

最先出版的成果是一批条约通商口岸的研究著作。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在其间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七五”期间,国家社科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等四个不同地区有代表性的重要城市列为重点研究课题,分别由四个地区的近代史研究者承担;“八五”期间又将近代区域城市群体的发展及不同类型城市的比较研究也列为规划课题。现已完成的主要著作包括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隗瀛涛主编的《近代重庆城市史》、皮明庥主编的《近代武汉城市史》以及罗澍伟主编的《近代天津城市史》等。^[4]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比较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上海城市形成、兴起、发展的原因,初步提出了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三条规律和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的九个特点。三条规律是:(一)走由商而兴的城市发展之路;(二)努力保持内部安定的环境;(三)坚持走开放之路。九个特点是:(一)典型的近代崛起的城市;(二)受西方影响最大的城市;(三)中国近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的城市;(四)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五)中国最大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城市;(六)全国文化中心;(七)移民城市;(八)富有反帝反封建斗争传统的城市;(九)畸形发展的城市。

而《近代重庆城市史》则重点对城市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重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近代重庆城市发展的原因与特点等方面进行了探索。特别对其兴起的原因进行了归纳,主要有以下三点:(一)开埠的影响,包括开埠引起的城市经济结构的变化、城市社会结构的变

化、社会观念和社会心理的变化等；(二) 商品贸易的发展；(三) 近代交通运输的发展。作者还从地理环境、成长动力和演变过程三方面来概括重庆发展的特点。从地理环境看,重庆是西南与华中、华北、华东及国外联系的枢纽,在近代成为长江上游最大的洋货分销中心和最大的土货购运中心。从成长动力看,重庆在近代的发展是内因和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外因又起了主要作用。从演变过程看,重庆城市起步晚,发展速度是突变型,特别得益于抗战内迁的强烈刺激。1998年重庆已成为全国第四个直辖市。

《近代武汉城市史》则着重探讨了武汉在近代的发展轨迹,并对武汉发展特点归纳为以下四点:(一) 因商而兴,商贸成为武汉城市运行的龙头;(二) 由内向型向与外向结合型的转变,成为国内埠际之间以及与国外贸易的重要枢纽;(三) 城市由沿河型转向沿江型,即从沿汉水转向沿长江发展;(四) 由于战争和大水等影响,城市发展线路扭曲多折。对武汉城市功能分析则归纳为以下七点:(一) 内河通海港口;(二) 中原陆路交通枢纽;(三) 内向与外向相结合的华中市场;(四) 轻重并举的工业基地;(五) 区域文化中心;(六) 区域行政中心;(七) 区域性、全国性革命风暴中心。

《近代天津城市史》总结了天津城市发展的四方面特质:(一) 天津地区在古代虽开发很早,但由于长期远离政治中心,城市聚落出现较迟。(二) 天津在历史上是中国政治重心北移后对首都至关重要的附属城市。(三) 天津城市自其出现之日起,便是一座沿河发展的、开放型的无城垣城市。(四) 天津是我国近代崛起的沿海通商口岸和工商城市。作者指出,与上海相比,一方面政治意义更大,开埠后天津九国租界并立,这在全国16个设有租界的城市中是独一无二的;另一方面1860年的开埠使天津作为首都附庸的格局被打破,天津逐渐脱离北京的控制,开辟了与华北各省商品交流的新网络。到

了 20 世纪 30 年代,天津的工业投资总额已居全国第二,成为仅次于上海的闻名全国的大都会。

以上这四大条约口岸城市研究的共同特点是“篇幅宏大,内容丰富,材料翔实,叙述畅达而观点新颖,历史与现实感俱强”。^[5]它们都以城市的近代化历程为主线,透视城市内部各方面的发展状况,展现城市发展的阶段性波动,总结城市发展的特点,揭示城市发展的规律。各书在具体的研究方法和编撰体例上,又各具特色,形成了一定的模式,先后为国内其他城市编写近代城市史所借鉴。这种模式的形成最主要是依靠作者们较好地运用历史研究法,同时采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口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重点突出,分析深入,有很强的说服力。然而,遗憾的是,虽然国内不少学者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大研究视野,将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从个案研究层次向类型城市、区域城市层次提升。但迄今为止,中国学者的近代城市史个案研究并未超越这一时期(20 世纪 90 年代初)“四城市史”的水准。依照杨念群的观点,“国内的城市史研究基本还处于条块分割式的功能分析阶段,习惯把城市发展仅仅切割成经济、政治、宗教等互不相干的几个部分,却看不出城市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复杂纠葛关系”。^[6]从目前已经出版的个案城市史著作来看,主要集中在部分大中城市的研究,而对情况复杂、功能差异较大的广大中小城市以及联系广阔的农村小城镇研究仍然很薄弱;就内容而言,经济研究是重点,城市社会、城市建设、城市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仍不够深入。

2. 城市类型与城市整体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重点城市研究的展开,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不满足对单体城市的研究,转而将目光投向不同类型城市、城市整体的研究领域。相对于个案城市研究而言,城市类型研究较多关注

城市的性质、特征、发展动力、条件以及城市发展的历史继承和时代变革,亦即城市近代化的问题。而城市整体研究则以城市类型为依据,比较全面、系统地从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研究城市的起源、古今发展的问題。毫无疑问,这些研究依然是在现代化研究模式下继续进行的城市研究。

城市类型研究领域,四川学者隗瀛涛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是国内研究城市类型的第一部重要著作。该书以现代化为主线对近代中国城市的城市类型进行了划分,对不同类型的城市的兴衰、发展原因、发展动力、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学者评价,它的出版标志着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从单体城市研究进入整体性、综合性的宏观研究,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称该书“是本世纪末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一部开创性力作”。^[7]

另外,自开口岸城市类型、条约口岸(或称通商口岸)城市类型、非条约口岸城市类型的研究也是近年来城市类型研究中成果颇多的领域之一。自开口岸城市研究,主要以四川学者杨天宏、广西学者唐凌为代表。杨天宏教授的论著《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是1994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书中重点从理论层面探讨了近代中国自开商埠思想实现的缘由、制约机制、分布情况、对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场域的拓展作用与影响以及开埠与城市的近代变革联系等。^[8]而唐凌教授则重点选取吴淞、南宁、昆明和三都澳几个不同类型的自开商埠进行具体分析,阐明它们的各自特性、个案与整体关系、各城市近代化进程,并对约开商埠与自开商埠以及中日两国开埠特征、效果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比较分析,指出自开商埠的成败得失,完全取决于国家的主权与国力。^[9]此外,相关论题的研究成果还有彭雨新的《论清末自开商埠的